

新正統學派——中共「建國」以來辛亥革命研究 之發展及其變化(下)

299-303

李 金 強

香港浸會學院歷史系講師

辛亥革命研究之新動向

自1979年起，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出版物大量刊行，至1981年慶祝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前後，更加出現了第二次研究高潮。根據統計，由1979年至1984年間正式出版之資料集及學術論著，合計二百種左右(包括重刊)，1979年至1989年刊登之學術論文亦達五千三百多篇，為前此三十年之十倍⁴⁸，數量實在龐大，其研究之蓬勃於此可見一斑，現時中、日兩國學者已經分別成文、成書、綜覽評論，可供參考⁴⁹。由於辛亥革命史學者之活躍，以及大量研究成果之出版，深受注目，此一領域已被公認為超過向居首位之太平天國史研究⁵⁰。現就上述豐富出版物中之通史著述、史料結集、以及研究課題三方面，與前此三十年之成果作一比較，從而瞭解其研究之新動向⁵¹。

(一)通史著述——「建國」後辛亥革命論著出版不管通論或專著，多為小書形成，如吳玉章、陳旭麓分別撰寫之「辛亥革命」，胡繩武、金沖及的「論清末的立憲運動」等書，其次有關專題研究，除發表於學術期刊外，主要以論文結集形式出版，如「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」，其研究特色仍以專題分析為主。文革後出現了新的著述形態，除眾多論文、專著繼續刊印外，最令人矚目者，莫如大型綜合學術性辛亥革命通史，接二連三地出版，主要包括以武漢為中心，由章開沅、林增平所主編之「辛亥革命史」(北京：人民，三冊，1980-81)；以上海為中心，由金沖及、胡繩武合編之「辛亥革命史稿」(上海：人民，四卷，1980，1986，1991)；和以北京為中心，由李新主編之「中華民國史」(北京：中華，一編兩冊，1981，1982)等三套。分別採取集體合作方式進行撰寫，各書皆以「辛亥革命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」，此一理論作為主綫

而進行編纂，全面描述及系統分析辛亥革命全局之發展⁵²。三書盡量總結「建國」以來有關之專題研究，說明了「新正統學派」已由專題分析之論文撰寫進展到「通史綜合」成書的地步⁵³。而大陸學者素所主張之「資產階級革命論」，亦透過上述大型通史的出版更形堅實與體系化。

(二)史料結集——辛亥革命史料，主要來自大陸與臺灣官方有關革命文獻之編刊，「建國」後國內辛亥革命史料之輯集，除了繼續「正統學派」編輯革命文獻之工作外，如政協所編「辛亥革命回憶錄」、「辛亥首義回憶錄」等，並且開拓辛亥革命時期民變史料及省區革命史料兩大課題之編纂，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「辛亥革命」八冊首開其先，繼而出版四川、雲南、貴州、江蘇、上海、廣東等省區資料，因而刺激中外學者從事「省區革命」研究此一課題⁵⁴。自1979年後除了繼續注意革命文獻收集及出版，其史料編刊之方向，顯然亦與前此有所不同。

其一，加強對「反動」統治階層官方檔案史料之結集。對於清政府檔案中有關革命運動記錄之史料，相繼整理與出版，其著者為「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」(北京：中華，1985)，「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」(中華，1979)，「清代檔案史料叢編」(中華，1982)，第八輯。此乃收錄趙爾巽全宗檔案選編有關辛亥革命的史料專集，以及第一歷史檔案館所主編「歷史檔案」雜誌，自八〇年代後不斷發表晚清官方資料等。其次，對於外國官方檔案編譯、鼓吹尤為不遺餘力，較著者如鄒念之譯「日本外交文書選譯——關於辛亥革命」(中國社會科學，1980)，胡濱編譯「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」(中華，1984)，及陳春華等譯「俄國外交文書選譯(有關中國部份，1911.5-1912.5)」(北京：中華，1988)等，上述利用「帝國主義」者官方記錄及其「走狗」清王朝之檔案所編刊而

成之史料，顯示出大陸學者已淡出「反帝、反封建」之教條，轉而重視「反方」記錄之整理。

其二，則為全國各地省、市、地區、政協為了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，相繼新刊本省、市、地區有關辛亥革命的「文史資料」及「檔案史料」，現時可見及者有湖北、湖南、四川、武漢、廣東、廣西、江蘇、浙江、山東、河南、福建、甘肅、雲南、貴州、吉林、遼寧、上海、蘇州、常州、南通、福州、泉州、莆田等省、市資料，其它相關之縣級「文史資料」亦為數不少；過去辛亥革命區域史料，向以省區為主，現時不但再次大量刊布省區史料，並且下移至基層行政單位，區域史料更見深入，對於辛亥革命各地之「微觀」及「個案」研究，極具參考價值，故此隨著省以下府縣及地區辛亥革命史料之不斷湧現，兼且現時大陸各地紛紛進行重新修志，辛亥革命省區以下地方行政單位有關革命人物、團體及其活動之研究，可以預期有進一步的發展⁵⁵。

(三)研究課題——此一時期新舊課題紛雜而出，成果奪目，就舊課題而言，多始於五、六十年代，包括辛亥革命中國社會之主要矛盾，民眾自發鬥爭，新軍、會黨之性質與作用，辛亥革命時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，帝國主義侵華、革命人物與團體(以孫中山和同盟會之研究最多)，以及革命黨人領導武裝起義等，顯示出反帝、反滿之羣眾運動及革命黨，實為其時研究之重心；上述不少課題踏入八〇年代，依然繼續受到注意，其中以孫中山及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兩方面最受重視，成果最為突出，實屬舊課題中之新進展者。至於新課題之開拓，更是令人目不暇給，包括立憲派重估，清末十年新政，辛亥革命時期人物如黃興、宋教仁、黎元洪等之重評，省區革命研究，南京臨時政府性質和作用，辛亥革命時期思想及文化之探討，外人與辛亥革命等，不勝枚舉⁵⁶，其中以立憲派重估和清末十年新政兩課題尤為別樹一幟，重視清末統治階層之改革與革命關係之研究，一反前此以羣眾運動及革命黨為重點之研究方向。國內辛亥革命研究課題之發展，至此顯然更為全面和深入。以下對期間若干課題之最具成績者，略加說明。

其一，孫中山研究——為期間辛亥革命研究中之首屈一指，以孫中山為主題之討論會，自1979年廣州舉行「孫中山與辛亥革命」一會後，接二連三召開⁵⁷，就出版而言，以十一卷本之孫中山全集最為矚目，有關專著超過十本，而論文則佔辛亥革命研究中之 $\frac{1}{3}$ 左右⁵⁸，孫中山研究再度受到重視而出現新高潮，胡繩武提出此乃與「瞭解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背景和國情」之現實有關⁵⁹。大陸學者其時對於孫中山之思想及活動各方面之探討與評價，

成果至為豐碩⁶⁰，然其中值得注意者有兩點：一為辛亥革命時期孫氏之歷史地位獲得高度肯定，表揚孫中山為中國民主革命之先行者，包括創建同盟會，與立憲派進行政治鬥爭，並且多次組織和領導武裝起義，又在辛亥革命後，成功領導「南京臨時政府」，孫氏無愧為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」之旗幟⁶¹，革命後孫氏所領導「南京臨時政府」此一「資產階級共和國」，及其後「讓位」袁氏問題均成為研究熱點，並且給予肯定之評價⁶²。另一則為孫氏思想之研究，包括對其早期思想傾向——革命或改良之討論，以及三民主義及哲學思想之研究，後者一直為大陸學者所注意，現時更由於建設「四個現代化」的影響，對於孫氏民生主義中經濟建設思想之研究尤多，主要集中在民初前後，孫氏振興實業及興辦鐵路之思想與活動之研究⁶³。

正當西方之「修正學派」對於孫中山及其「獨一無二」之革命領導地位，不斷地提出質疑之際，而大陸學者卻相反地掀起了孫中山研究熱潮，以及首肯其歷史地位，中外學者對於孫中山之研究，由是涇渭分明。

其二，辛亥革命時期的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——從五、六〇年代開始，國內史學界已經注意近代中國資產階級之研究，對於其形成時間、階層劃分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⁶⁴。然而，由於中共乃以「農民革命」起家，近代中國革命動力，遂以農民革命和農民鬥爭的評價較高，而資產階級之地位與作用則相對地偏低，文革後國內學者聲稱此乃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「主要錯誤傾向」⁶⁵。而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，再次成為研究之熱門課題，1981年武漢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，即以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為主題，其後「歷史研究」編輯部和復旦大學歷史系又合辦「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學術討論會」，並且出版論文集，除繼續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形成時間、階層劃分作出進一步研究外，而且突出地討論辛亥革命時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地位與作用。其中以章開沅為首的國內學者，採用分地區、分行業之方法，透過對辛亥革命時期之江浙、上海、蘇州、廣東、武漢、湖南，以至河南、遼寧、蒙古各地之資本主義發展與民族資產階級活動之專題進行研究，提出不少新觀點，指出民族資產階級隨著個別工、商企業的創設，並於各地紛紛組織各級商會(總會、分會、分所)、商團，且藉此參與當地之經濟社會及政治等各種活動，其影響力日漸增大，具有「登高一呼，眾山皆應之勢」⁶⁶，而清末商會研究，由是連帶受到重視，成為新興研究課題⁶⁷。

根據上述之研究，民族資產階級與清季反帝愛國、收回權利、請求立憲及參與革命等運動，均具密切關係，故此大陸學者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在辛亥革命時期，雖然仍有

其不足之處，然根據上述表現，以及敢於鬥爭、敢於革命之性格，無形中使其取得「時代中心」的地位⁶⁸，由此可見大陸學者對於辛亥革命時期民族資產階級的地位及作用，已取得較為肯定的共識，而「資產階級革命論」的觀點顯然更為堅定。

其三，立憲派及立憲運動之重估——新正統學派在強調反帝反封建之教條下，清朝統治者向被視為帝國主義的「走狗」，而立憲派則被視為「反動派」，在革命為「進步」之概念下，「和平改革」自然受到責難。故文革前有關立憲派之研究甚少，且大多對其持否定，立憲派被指斥為革命派的敵人⁶⁹。及至1978年，據云「從海外傳來了一些議論」，此即臺灣學者關於立憲派對清季革命貢獻之研究與觀點⁷⁰，從而引起大陸學者對於立憲派研究之興趣，重新評估立憲派與立憲運動的地位與作用，至八〇年代初有關論文已經不下四十多篇，除了對立憲派之階級基礎，該派與清廷、革命派的關係，辛亥革命前後之角色等問題深入探討外，並且對立憲派所從事的活動，包括君憲理論宣傳、興學育才、學術與出版、收回權利運動、民族資本工商業、國會請願運動，以至最後參加革命，均認為具有積極意義，從而肯定清季立憲派之歷史地位與作用⁷¹。

其四，清季十年改革之研究——庚子拳變後，清廷實施新政及預備立憲，對國家體制進行改革，影響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甚大⁷²。過去國內學者對於此一階段統治者進行改革之歷史，多採否定，認為清廷改革之目的在於抵制革命，而預備立憲則甚至被視為「政治騙局」⁷³，隨著1979年以來有關立憲派重估之熱烈討論，大陸史學界亦對於晚清十年改革之措施及其影響，開始產生興趣，紛紛進行研究，有關論文至今仍然陸續出現，並且出版專著⁷⁴。觀察此一課題之研究成果，顯示大陸學者對於清政府於晚清十年之新政與改革，已轉採較為肯定之觀點⁷⁵，不但對期間倡導改革之官僚與士紳，如袁世凱、張之洞、張謇等重新評估⁷⁶，並且對於一系列之改革措施進行個別探究，包括官制改革⁷⁷、諮議局與資政院⁷⁸、地方自治政策⁷⁹、新學堂興辦⁸⁰、新軍編練⁸¹、振興實業⁸²以及新政之財政⁸³等各項。同時，上述有些研究，顯示出較為年輕一輩的辛亥革命史學者，開始借助西方近代化理論進行結合研究，尤為其特色⁸⁴，從而提出新政乃「國家體制」近代化的開端，並考察其對清季十年社會變遷所產生之影響。大陸史學家對清季統治階層及其「和平演變」之改革措施所帶來之近代化成果之研究和肯定，與前一階段「革命史學」所強調之「階級鬥爭」顯然今非昔比，抑且大異其趣！

結 論

綜觀中國大陸之辛亥革命研究，以1979年為其分水嶺。前此於建國初期，主要在「毛澤東思想」影響下，除了肯定孫中山及辛亥革命之歷史地位外，並且提出辛亥革命為一「資產階級革命」之理論。其時著述皆劃清階級界線，造反者如革命黨及民變受到重視，與此相反之革命「對象」——帝國主義者及其「走狗」清廷，則備受強烈之譴責，充滿革命色彩，文革期間更為變本加厲，及至文革告終，中共「建國」之合法性獲得國際普遍認可，並且對外採取開放政策，強調「四化」及「統一」，注意「建設」之重要性，大陸史學界遂得與外界接觸，開始瞭解「非馬克思主義」如臺灣、英、美等地之辛亥革命研究成果，其研究課題與觀點，亦因而有所變化，清季統治階層，包括政府官僚與立憲派之改革措施及活動受到重視，並肯定其建設性；故不但一反過去否定統治階層之史觀，並且對於「和平改革」之路線表示認同，進而強調其「近代化」之意義，由此可見大陸辛亥革命史研究反映出由過去注重革命之「破壞性」，改為重視改革之「建設性」。章開沅的一段說話最足以證明，他說：

「……然而革命畢竟不是最後目的，也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因，它更不能涵蓋歷史的全部內容，只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，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因，也是革命為之奮鬥的終極目的……。」⁸⁵

此一階段大陸辛亥革命史研究之對象，方法與觀點產生變化及轉向，若比對前期之「革命史學」，或許可以稱之為「建設史學」，上述研究特質之定名，對於1979年後大陸辛亥革命研究動向，自可增加吾人之體會。

根據法國著名史家Francois Furet對於革命之分析，認為革命新政權之難題要如何結束一場革命，並以民主及法制結束由革命所形成之人民反抗與不服從的習慣，從而建立一合法權力穩定體制⁸⁶，中國史學素與時代及政治現實具有密切之關係，辛亥革命研究課題之轉變，由過去重視「造反」轉而注意「建設」，也許正在暗示著近百年中國革命之火紅時代，已經到了接近終止之階段，而應該出現新的時代開端吧！

**本文初稿曾於香港浸會學院主辦之“China & Hong Kong at a Crossroad研討會”(1990年9月)宣讀。

注 釋

48. 羅福惠：「辛亥革命研究四十年」，同注29，頁47。

49. 林增平：「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評」，陳旭麓、何澤福「辛亥革命」，趙矢元、段雲章：「辛亥革命」，章開沅、劉望齡：「辛亥革命史」，張磊：「辛亥革命史」，上列五文依次刊載於

- 1973, 1981, 1982, 1983, 1985年《中國歷史學年鑑》。又狹間直樹編：「中國歷史の新しい波——辛亥革命研究しこつて」(東京霞山會, 1985)一書。
50. 張海鵬：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回顧」，近代史研究，6期(1989)，頁10。
51. 關於期間大陸辛亥革命之重要出版物，可參辛流「辛亥革命史書目」(1979-1984年大陸出版)，辛亥革命史研究通訊，22期(1985)，頁14-25。
52. 林增平、林言椒主編：「中國近代史研究入門」。同注7，頁219-227。
53. 張海鵬：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回顧」，同注50，頁10。
54. 李金強，同注1，頁763-764。
55. 石田米子：「光復會和浙江辛亥革命」，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，第四輯(1985)，頁66-73。該文以浙江出版「文史資料」為例，說明對於光復會、陶成章及秋瑾以至浙江各地如山陰縣、嘉興、金華等提供了不少新史實，有助研究。
56. 郭漢民、李育民：「辛亥革命史研究概述」，同注22，頁5-20，石田米子：「參加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感想」，松本英紀：「中國近代人物的重新評價——記宋教仁討論會」，「一九八八年黃興研究學術討論會」，三文均見於辛亥革命史研究會通訊，12期(1982)，頁19；31期(1988)，頁11；33期(1988)，頁1-20。
57. 主要有四次會議，包括(1)孫中山學術討論會(廣州，1984年11月20至26日)，(2)孫中山研究述評國際學術討論會(涿縣，1985年3月22至28日)，(3)青年學者孫中山學術討論會(廣州，1986年7月25至30日)，(4)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(中山，1986年11月4至11日)，見李金強，同前注，頁767-768，及注30。
58. 羅福惠：「辛亥革命研究四十年」，同注29，頁46-47。
59. 金沖及：「參加這次討論會的幾點感受」，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通訊，4期(1986)，頁11。
60. 段雲章、周興樑：「孫中山研究述評」，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述評(北京：人民，1986)，頁366-380。
61. 陳錫祺：「孫中山和辛亥革命」，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論集(廣東：中山大學，1984)，頁1-34。
62. 郭漢民、李育民：「辛亥革命史研究概述」，同注22，頁136-141。徐梁伯：「應該重新評價『孫中山讓位』」，社會科學戰綫，4期(1980)，頁166-172。
63. 段雲章、周興樑，同注60，頁377，李安慶：「孫中山關於中國鐵路的設想」，一次反封建的偉大實踐(江蘇：人民，1983)，頁365-377。章開沅：「不知疲倦的探索者」，廣東孫中山研究會通訊，4期(1986)，頁13-15。
64. 林增平、林言椒編：「中國近代史研究入門」，同注7，頁513-518。
65. 劉耀：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幾個問題」，新華月報，8期(1980)，頁75-78。
66. 郭漢民、李育民：「辛亥革命史研究概述」，同注22，頁47-52，朱英：「清末蘇州商會的歷史特點」，歷史研究，1期(1990)，頁134-149。
67. 朱英：「清末商會研究述評」，史學月刊，2期(1984)，頁112-116，關於商會與辛亥革命關係之研究，以朱英之研究最為突出，可參朱英：「清末商會與辛亥革命」，華中師範大學學報(哲社版)，5期(1988)，頁78-85，「清末商會的成立與官商關係的發展演變」，社會科學戰綫，2期(1990)，頁205-212。及「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」(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，1991)一書。
68. 楊立強、沈渭濱：「『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』討論會綜述」，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(上海：復旦大學，1986)；續編，頁513-517。
69. 郭漢民、李育民：「辛亥革命史研究概述」，同注22，頁98-103。
70. 陳旭麓、何澤福：「辛亥革命」，一九八一年中國歷史學年鑑，頁116。據李時岳來港出席「近代臺灣的社會發展及民族意識」會議(港大校外課程部主辦，1986)時面告，此一課題乃受臺灣學者研究成果之影響，關於臺灣學者對於立憲派研究的成果，見李金強，同注1，頁778-781。
71. 侯宜杰：「清末立憲運動研究史述評」，近代史研究，3期(1985)，頁159-187。以國會請願運動為例，應看作衝擊君主專制制度的民主運動，而非前此所謂維護清朝專制統治的「反動」的運動，參耿雲志：「論清末立憲派的國會請願運動」，轉載於「辛亥革命」，同注22，頁375-393。
72. Mary R. Wright(ed.), *China in Revolution: The First Phase, 1900-1913* (New Haven & London,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68), pp.1-63
73. 郭漢民、李育民：「辛亥革命史研究概述」，同注22，頁114-115。
74. 喬志強：辛亥革命前的十年(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87)。
75. 張連起：「關於清末新政的幾個問題」，北方論叢，2期(1990)，頁87-90。
76. 戴逸：「序言」，載於侯宜杰：「袁世凱評傳」(河南教育，1986)，頁1-5，章開沅：「《張之洞評傳》序言」，「對於張謇的再認識」，均載於「辛亥革命後史事論叢」(武昌：華中師範大學，1990)，頁267-278，441-445。
77. 呂美頤：「論清末官制改革與國家體制近代化」，河南大學學報(哲社版)，4期(1986)，頁81-88。
78. 韋慶遠等：「論諮議局」，近代史研究，2期(1979年)，頁230-249；耿雲志：「清末資產階級立憲派與諮議局」，紀念辛

- 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文集(北京：中華，1983)中冊，頁1183-1230，于伯銘：「清末的資政院」，歷史教學，12期(1981)，頁16-19。
- 79.朱英：「試論清政府地方自治政策及其影響」，史學月刊，5期(1989)，頁37-43。
- 80.王笛：「清末新政與近代學堂的興起」，近代史研究，3期(1987)，頁245-270。桑兵：「清末興學熱潮與社會變遷」，歷史研究，6期(1989)，頁13-27。
- 81.喬志強：「論清末『新軍』」，同注74，頁152-170。
- 82.鄭起東：「清末『振興工商』研究」，近代史研究，3期(1988)，頁30-48；沈祖煒：「清末商部、農工商部活動述評」，

-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，2期(1983)，頁100-110。
- 83.梁義羣：「清新政與財政」，歷史檔案，1期(1990)，頁101-106。
- 84.關於近代化理論引入與中國近代史結合研究，可參章開沅：「《中外近代化比較研究叢書》總序」，「把人類作為一個整體——布萊克《現代化動力學——比較史學研究》中譯本序言」，辛亥前後史事論叢，同注76，頁412-421，455-461。
- 85.章開沅：「對於張謇的再認識」，同注76，頁271。
- 86.姚蒙：「建立一種批判的大革命史學——訪法國著名史學家弗朗索瓦·孚雷」同注5，頁80。

漢學研究中心叢刊 目錄類第11種

中外六朝文學研究文獻目錄(增訂版)

洪順隆 主編

本書由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洪順隆教授主編，內容包括有關六朝文學的論文及專著，增訂後約7,500條。係以斷代形式編成之文學專題目錄，呈現六朝文學研究成果的全貌。篇末附作者索引。

出版 民國81年(1992)6月

訂購 1 臺灣地區每冊新臺幣400元 Taiwan area NT\$400 per copy
2 其他地區每冊美金30元(含郵費) Other areas US\$30 per copy (postage included)

* 外幣支票每張另附銀行滙兌手續費美金10元，Please add US\$ 10.00 per check as a foreign currency check
